

【区域战略研究】

绿色金融赋能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白科 郑晓宁 周健

摘要: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以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坚持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的路径作为内在要求。绿色金融作为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是进一步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关键金融支撑,也是实现金融业自身转型发展和中国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绿色金融通过引导资源配置、发挥成本优势、优化风险管理以及促进传递信号等,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绿色产业集聚与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构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当前,制度困境、市场困境、产品困境和服务困境正制约绿色金融赋能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因此,要健全绿色金融制度体系,引导绿色金融市场服务实体经济,不断创新绿色金融产品,坚持“金融为民”的价值取向,夯实绿色金融赋能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基础。

关键词:绿色金融;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内在逻辑;实践路径

中图分类号:F832;X1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766(2026)01-0072-11 收稿日期:2025-08-23

*基金项目: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实践项目资助“生态补偿赋能县域生态产业发展的机制、路径与效应研究”(BZZKY-Y202510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城市返乡农民工劳动力供需适配的统计测度研究”(24BTJ050)。

作者简介:白科,男,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081)。

郑晓宁,女,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北京 100081)。

周健,女,齐鲁师范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教授(济南 250202)。

一、引言

2024年4月,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时强调,西部地区在全国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中举足轻重。要一以贯之抓好党中央推动西部大开发政策举措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力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西部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以此为战略定位,始终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路径,探索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模式。绿色发展既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内在要求,亦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底色。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推进的背景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已成为西部地区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弯道超车”的关键突破口。

绿色金融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支撑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引擎,其战略地位持续凸显。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2024年3月与10月,中国人民银行分别联合其他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强化金融

支持绿色低碳发展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发挥绿色金融作用 服务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为绿色金融的规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绿色金融不仅有助于降低生态环境风险，还能推动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与绿色产业的创新和发展，提高区域经济发展竞争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当前学界关于绿色金融赋能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绿色金融自身发展、绿色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金融赋能西部大开发三个维度。第一，在绿色金融自身发展的维度，通过梳理绿色金融的起源、发展以及全球实践，可知绿色金融发展具有显著外部性(何茜, 2021)，要充分认识到完善的绿色金融体系可以从根本上支持绿色经济的发展，是建设金融强国的必然选择(王遥, 2024)。为解决中国绿色金融在探索发展中的法律法规建设滞后、金融机构认知不足、金融产品服务单一、地区发展不均衡等突出问题(邵光学, 2019; 薛博文等, 2024)，何德旭等(2022)提出持续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支持体系、培育多元化和时代化绿色金融机构、强化绿色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先行先试、区域带动等措施。第二，在绿色金融支持高质量发展的维度，绿色转型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强调绿色金融是解决融资问题、支持绿色技术创新的主要途径；另一方面，强调公众、企业与国家三方共力，从意识培养、行业规制、平台孵化、政策引导等视角加强绿色金融对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王志强等, 2020; 文书洋等, 2022)。第三，在金融赋能西部大开发的维度，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后，基于“金融为什么支持西部大开发”“金融怎么样支持西部大开发”的问题，学界提出建立健全金融支持体系、确立金融支持目标和重点的措施，同时注重开发性金融、政策性金融的支持作用(陈文俊等, 2000; 林凌等, 2005; 白津生, 2009)。脱贫攻坚时期，特惠金融向普惠金融、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养老金融的多元化转型，一是实现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从“输血”向“造血”转变，二是助力西部大开发进一步实现区域均衡发展(朱冬亮, 2020; 程惠霞, 2021)。在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新方位建设要求金融发展注重拓展绿色环保业务开发、加强省际分工合作交流、完善金融全过程规章制度(季宇等, 2021; 蔡之兵等, 2024)。

综上所述，当前研究较多侧重绿色金融的影响与发展，在政策体系建设、市场机理分析、产品创新、风险防范能力等内容进行研究。金融赋能西部大开发的文章更多强调金融支持传统产业升级转型、促进西部地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长效机制、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以建设和盘活区域经济发展动力来构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新格局。针对西部地区的政策、资源、人口与环境等领域的优势基础，就绿色金融赋能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而言，现有研究较少，且未能系统说明绿色金融在赋能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的作用。基于此，本文通过阐述绿色金融赋能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和实践路径，希望在当前研究的基础上为绿色金融赋能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思路建议。

二、绿色金融赋能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内在逻辑

为进一步形成大开放、大保护的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西部地区必须依靠绿色金融引导资源要素的不断流入、创新成果的不断应用、风险管理的不断优化和宏观调控的不断改革来实现供需平衡。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础上，实现资源要素配置的效用最大化，有力推动传统企业转型升级，加快形成绿色产业集聚与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建立健全宏观调控的信号传递机制，奋力实现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见图1)。

(一)资源配置:绿色金融通过引导资源配置促进要素投入产出的效用最大

绿色金融立足于自然资源优势，通过拓宽投融资渠道解决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贫血”问题，通过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西部地区，通过支持技术创新并进一步提高要素投入产出的效用，加快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第一，绿色金融拓宽投融资渠道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贫血”问题。无论是传统产业的绿色转型升级，还是绿色企业的成立和发展壮大，都需要充足的资金作为改造成本，这类资金的投资周期长、回报较晚，仅靠财政补贴难以支撑庞大的市场需求。绿色金融作为服务西部大开发的重要“血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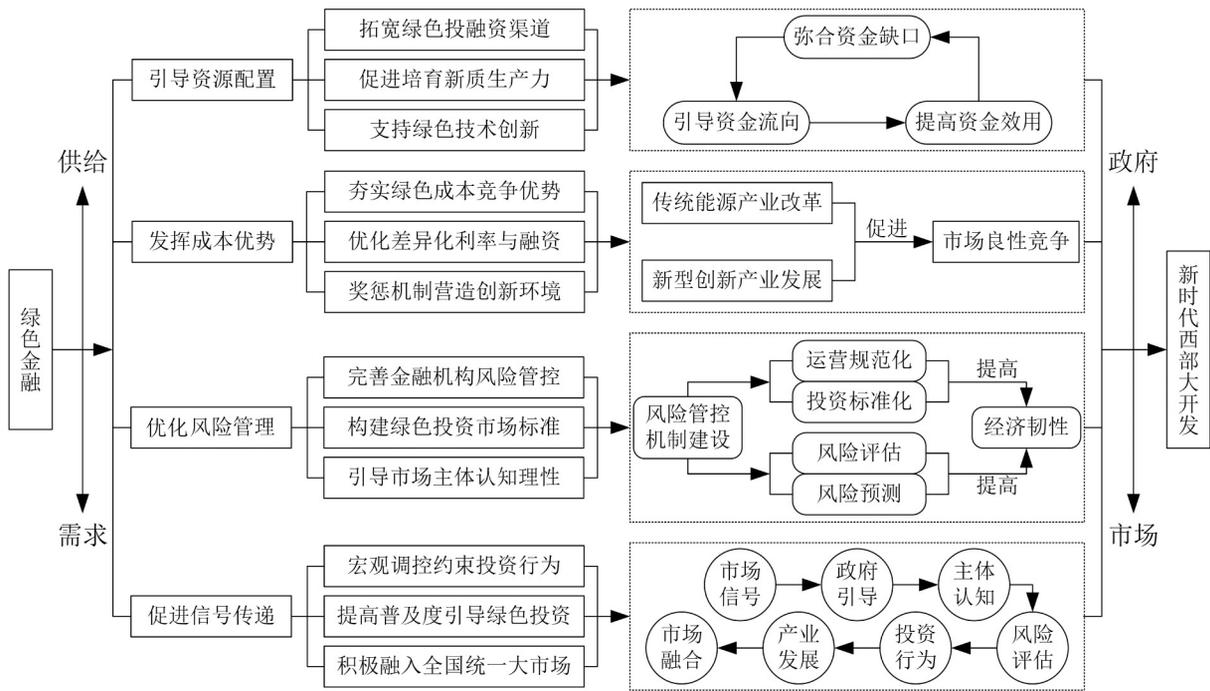


图1 绿色金融赋能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内在逻辑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之一,在一系列政策激励措施和市场引导下,拓宽投融资渠道的同时对资金进行优化配置,实现专项资金和金融产品精准投入绿色项目与产业,解决绿色经济发展的“贫血”问题(高世楫,2024)。纵观西部地区能源发展领域,煤炭、石油等传统能源产业在耗能污染环节的整治与节能减排设备的更替,以及光伏、氢能等新型能源产业在动能转换窗口的衔接与整体布局方面的部署,都需要绿色金融提供精准支持,绿色资本的优化配置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绿色金融促进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并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西部地区。绿色金融资本的流向能够引导劳动力迁移、产业转型升级以及技术创新的判断和预期,有利于培育新质生产力并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西部地区,支持绿色相关产业开展一系列创新性技术活动和跨区域合作交流,不断提升绿色经济发展活力和潜力,以培育新质生产力为根基,实现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第三,绿色金融支持技术创新并进一步提高要素投入产出的效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北方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区、西北荒漠绿洲交接生态脆弱区、西南岩溶山地石漠化生态脆弱区、西南山地农牧交错生态脆弱区、青藏高原复合侵蚀生态脆弱区等典型地区引发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与经济社会发展

要求背离,生态文明建设、“两山”理论等绿色发展理念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导。通过绿色金融支持清洁生产过程提高效率、降低污染排放、提升技术水平,有效推动了资源的节约利用和生产过程的绿色化程度,不断降低原材料浪费与污染排放的非期望产出,保护生态环境并提升可持续性水平。

(二)成本优势:绿色金融通过发挥成本优势推动传统产业发展的转型升级

西部大开发进程中,传统能源产业仍占据主导地位。在此背景下,绿色金融可通过多重作用机制驱动产业向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低碳排放的绿色可持续路径转型,进而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提供支撑。

其一,绿色金融通过成本约束机制倒逼传统产业转型。西部地区煤炭资源量占全国总量的90%以上,陆上天然气资源量占全国陆上总量的87%。原油产量贡献率超40%,三大能源品类共同构成中国传统能源供应的压舱石。由于非绿色资本成本的上升,一方面,对传统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产业的生态破坏行为形成有效规制,形成更为充分的市场竞争;另一方面,提升传统产业参与技术创新的内生动力与主动性,推动企业及全行业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的整体跃升(王勃,2024)。基于对绿色技

术创新的正向激励,绿色金融通过优化市场竞争关系,以成本约束倒逼传统产业改革,助力构建企业与行业层面的绿色技术创新生态。而整体创新生态的改善,将为构建大保护的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其二,绿色金融通过差异化融资门槛引导能源产业升级。绿色金融的核心特征在于依据行业属性与环境保护程度,实施差异化利率与融资准入规制。清洁能源产业具有响应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需求,契合高质量发展理念,在融资过程中可获得资金规模与信用评级的显著倾斜。特别是对于太阳能(太阳能资源年总辐射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风能(80米高度下的风能资源技术可开发量达 $23\times 108\text{KW}$,占全国风能资源的66%)、水能(长江、澜沧江等水系的落差形成巨大水能潜力,水电开发条件得天独厚)等清洁资源总量占据全国主导地位的西部地区而言,这一机制将倒逼传统能源企业与新型能源企业加大绿色技术研发创新力度,通过降低资金成本与生产成本,在全行业形成控制成本、推广绿色技术应用的竞争态势,最终实现资金效用的最大化(白彦锋,2023)。

其三,绿色金融通过多元化奖惩机制激励技术迭代。一方面,绿色金融通过直接金融支持为企业提供低成本资金,支撑绿色技术链的研发与应用;另一方面,借助绿色产业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府激励手段,为绿色行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撑。近年来,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业务的开展,已引导传统企业将人工智能、区块链、大数据等新技术嵌入生产全流程,推动绿色生产模式转型;同时,鼓励新型企业秉持绿色惠民、绿色富国、践行绿色承诺的发展理念,将绿色发展观贯穿于绿色技术创新全过程,加速绿色行业的发展进程。

(三)风险管理:绿色金融通过优化风险管理体系促进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

绿色金融通过构建风险管控与环境评估体系,强化投融资全流程管理、推动绿色投资标准的制定与落地、缓释产业转型中的市场不确定性风险,借助科学化、多元化的风险防控手段提升经济发展韧性,进而支撑西部地区绿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绿色金融通过强化金融机构环境风险治理能力来缓释不良资产风险。对于经济韧性相对薄弱的西部地区来说,绿色金融系统的稳健运行有

助于提升环境风险的识别、评估与预警能力,从而降低不良资产累积风险;同时,健全的风险管控机制能够规制绿色金融参与主体的行为边界,约束企业的资源浪费与环境破坏行为,进而提升经济运行的质量与效率。

其次,绿色金融通过规范投资行为推动绿色投资标准的完善与落地。绿色金融通过项目投资环节的风险管控,一方面,帮助企业缓释环境合规风险与社会声誉风险,塑造绿色责任形象与社会公信力,增强投资者认同(朱朝晖,2020);另一方面,促进绿色金融市场的规范化运作,助力金融机构与投资者精准识别环保项目的真实价值信息,提前预警潜在投资风险,最终推动科学统一的绿色投资标准体系形成。

最后,绿色金融通过认知引导来缓释产业转型引致的市场波动风险。“双碳”目标提出后,市场主体对传统化石能源产业与新型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前景存在认知偏差,导致高碳资产持有主体的转型风险与新兴产业的孵化风险持续攀升。绿色金融通过引导市场主体建立理性认知框架,同时通过开发风险度量工具进行量化识别,有效缓释不确定性风险,引导企业优化布局结构,深化金融市场主体的风险判断能力与认知深度。

(四)信号传递:绿色金融在宏观调控下通过促进信号传递推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

市场机制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基础引导作用,但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需依赖政府“有形之手”的调控矫正。绿色金融通过宏观调控向市场传递有效信号,引导传统企业投资决策,同时通过提升绿色金融普及度引导公众投资行为,进而完善绿色金融市场秩序,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高质量推进提供支撑。

第一,政府通过政策激励与信息披露等方式规制引导企业投资行为。政府部门通过出台支持传统产业转型与绿色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释放明确政策信号,引导资金精准流向转型企业与绿色产业,有效发挥绿色金融服务绿色低碳经济的功能(刘华军,2023)。同时,通过规范信息披露制度,推动监管部门公开企业环保奖惩信息,引导金融机构对企业绿色行为开展投融资资质综合评估,激发市场主体竞争活力,培育行业先发优势。

第二,金融机构通过提升绿色金融产品普及度

引导公众绿色投资。依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金融机构绿色产品信息披露的监管要求,金融机构可构建绿色金融产品标准体系,主动披露环保信息与风险提示,强化行业信息传递,提升产品透明度与普及度(李翔宇,2023)。此举协同宏观调控矫正市场失灵,通过融资成本优势强化企业环保行为与环境治理能力,引导公众绿色投资决策,助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第三,绿色金融通过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市场秩序完善。全国统一大市场框架下,绿色金融产品交易定价纳入多元化绿色抵质押工具,进一步提升绿色产品交易活跃度,激励金融机构深度参与绿色交易过程,构建绿色企业投融资的有效渠道。随着中国绿色金融交易市场的发展,参与主体扩容、公众投资者深度参与、金融衍生品创新将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奠定广泛金融基础,推动绿色金融市场秩序持续优化。

三、绿色金融赋能破解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现实困境

当前,中国绿色金融赋能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主要面临绿色金融制度建设不完善、绿色金融市场拉动作用不强、绿色金融产品供需不匹配以及绿色金融服务作用发挥较弱的困境。

(一)制度困境:绿色金融制度建设不完善

近年来,中国绿色金融市场发展成效显著,绿色金融工具日益丰富,但政策体系不完善、法律制度不健全、监管机制待强化,仍是绿色经济发展及构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大保护新格局的关键瓶颈和制约。

首先,绿色金融政策体系存在短板,导致西部地区绿色专项资金投资回报率偏低。政策架构方面,缺乏统一的专业指导与分类规划,各地绿色金融支持政策及行业标准存在显著差异,致使投融资水平呈现明显地域分化;加之西部地区金融基础薄弱,绿色项目支持力度有限,直接拉低了投资回报率。业务实践方面,绿色债券、保险、基金等业务缺乏专属专业化指导,多依附于相对成熟的绿色信贷体系执行(姚进,2024),导致金融机构在开展业务时面临政策协调困境,经营风险与业务不确定性攀升,最终制约了西部地区绿色专项资金投资回报的

可持续性。

其次,绿色金融法律制度存在缺陷,尚未形成支撑绿色产业发展的金融合力。从立法层面看,现行绿色金融法律体系尚未形成专门立法,多依赖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发布的指导意见与规范性文件,未明确市场主体的权利义务与责任边界,缺失具体操作标准(夏梓耀,2018)。从执行层面看,指导意见不具备法律效力,难以形成刚性监管约束;同时,环境法律责任普遍偏轻,抑制了企业与公众对绿色金融的需求,导致绿色金融尚未成为市场发展的核心关切。从操作层面看,现有制度对业务规范与责任划分模糊,缺乏必要的环境责任奖惩机制,针对性与可操作性不足,未能凝聚支持绿色产业发展的金融协同力量。

最后,绿色金融监管机制不完善,制约了西部地区绿色经济发展的统筹协调。随着绿色金融市场扩容,绿色金融工具的多元化使监管内容日趋复杂;尽管分领域合作机制正在逐步构建,但因绿色金融覆盖范围广泛,现行监管体系针对性不足;加之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发展水平偏低,监管的区域适配性不足,致使绿色行业不规范发展问题凸显,最终导致西部地区与中东部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呈现耦合背离态势。

(二)市场困境:绿色金融市场拉动不强

西部地区绿色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与绿色金融市场存在的区域发展失衡、参与主体发育不足、经营能力有限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制约绿色金融驱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核心市场梗阻。

第一,区域绿色金融发展失衡,难以破解地区转型的现实困境。2022年西部地区有9个省(区、市)的绿色金融发展综合得分未达到全国平均值,而省际的绿色金融发展综合得分也存在较大差异^①。尽管贵州(2024年一季度末绿色普惠信贷余额达1136.84亿元,绿色贷款余额7566.69亿元)、新疆(向新能源企业发放超9.05亿元贷款,发放3.6亿元专项资金支持绿色基建,累计通过碳账户发放226.7亿元贷款)、重庆(先后设立29家绿色金融专营组织,推出330余款绿色金融创新产品,累计提供资金逾160亿元,全市绿色债券余额达345亿元)等省(区、市)的绿色金融发展显著(张东刚等,2025),但深受自然资源禀赋、金融生态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导致区域间绿色金

融发展不均衡、政策执行力度与效果差异明显的现象,在支持传统产业低碳转型、新型绿色产业孵化及绿色金融科技创新等领域供给乏力,难以突破对高污染、高排放、高耗能的传统生产力路径依赖。

第二,参与主体发育不足,难以匹配绿色经济的金融需求。从市场结构看,绿色金融仍以绿色信贷为主导,存在覆盖域狭窄、发展模式单一化等特征;尤其是在西部地区处于绿色转型深化期,对多元化融资模式的创新需求亟待满足。从主体动能看,政策性金融机构虽为核心参与者,但对陕西(能源产业仍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五成以上)、宁夏(高耗能行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约60%,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耗总量比重达80%)等具有明显倚重倚能特征的地区而言,出于绿色经济开发成本与风险的考量,部分法人银行对高碳行业资产价格波动较为敏感,信贷资源对能源行业的风险敞口较大,风险传染性、关联性较强(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金融稳定分析小组,2024)。

第三,主体经营能力存在短板,制约对西部大开发技术创新的持续性投入。脱贫攻坚阶段,绿色金融多服务大型企业环保项目,中小企业与个人获取服务难度大;针对深度贫困地区、契合农村市场主体可持续需求的多元化服务能力有限,绿色金融支持脱贫的创新不足(任缙,2019)。此外,绿色金融产品具有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特征,与传统金融追求高效低风险的经营模式差异显著;市场主体不仅面临理念转型的挑战,经营能力亦难以适配现有模式,导致项目商业性与公益性平衡机制缺失,影响对西部大开发技术创新的持续投入。

(三)产品困境:绿色金融产品供需不匹配

鉴于自然区位、经济社会和人文历史因素,西部地区金融产品发展表现出创新能力不足、标准化程度不均衡和服务对象参与性不积极等短板,尤其是在绿色金融走深走实过程中,仍对构建大保护的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存在局限性。

第一,绿色金融产品的创新能力不足,制约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绿色转型发展的市场主体扩大。基于资源优势,西部地区形成了以资源开发和粗加工为主的资源型经济,呈现典型的“三高一低”特征,传统发展的惯性思维优先于绿色发展理念,生态环境保护形势依然严峻。绿色金融作为服务绿

色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由于缺乏本土化资源和先进性经验,产品开发与创新能力往往低于依赖传统发展方式快速实现经济发展的诉求。当前西部地区的绿色信贷占比高,直接融资产品不够丰富(苏赟,2024),同质化绿色金融产品难以满足客户定制化和个性化金融需求,仅靠单一化的绿色金融产品难以实现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的转型升级,更难以撬动市场主体参与西部地区绿色经济发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第二,绿色金融产品的标准化程度不高,制约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市场信息透明度。从国内行业标准发展来看,由于缺少成文的绿色金融产品分类法律法规,绿色金融产品的信息透明度不高,相关细节并未披露。同时,地方性金融机构在金融产品信息披露过程中的上传下达、下情上报和左右协调工作的执行标准不一致,导致灰色地带持续扰乱绿色金融市场秩序。从国际行业标准发展来看,“一带一路”倡议下,西部地区的绿色金融产品在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和评估等阶段的标准、流程和法律法规难以满足东道国要求,在标准对接过程中也存在一定困难(赵亚娜,2023),易滋生出口企业的“漂绿”行为,从而进一步制约大保护、大开放的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新格局建设。

第三,绿色金融产品的服务对象参与程度不均衡,制约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普惠性和可及性。西部地区具有能源资源禀赋型经济发展特点,决定了随着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深化,以国有企业控股或者直接参与的、以传统能源和传统产业为发展核心的大型企业为主的绿色产业布局必须长期坚持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道路(胡健,2023),因此,绿色信贷投放领域多集中在该类企业,形成了对传统绿色项目的信贷支持相对饱和的状态。民营企业 and 中小微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缺乏绿色金融产品服务和社会资本参与,庞大的资金缺口难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因此,民营经济的“三座大山”不仅制约自身的绿色发展与转型,更制约着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绿色发展的普惠性和绿色成果的可及性。

(四)服务困境:绿色金融服务作用发挥较弱

西部地区在绿色金融意识与服务、环保信息管理与披露、绿色价值核算与风险评估等方面的短板,阻碍市场主体对于绿色产业和项目的判断,进

而影响绿色金融服务的适配性和安全性,制约西部地区绿色高质量发展。

第一,绿色金融意识淡薄与服务能力有限,影响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绿色项目价值判断。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不仅关系到全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也关系到国家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脱贫攻坚时期,金融扶贫不仅提供金融产品,也强调提高贫困群体的金融意识与能力建设,从而奠定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现实基础。就西部地区的金融市场现状而言,在公众以及市场主体层面,绿色金融意识淡薄、金融素养偏低以及绿色金融服务能力有限等问题,是当前阶段绿色金融赋能构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最重要的阻碍之一。“不了解产品特性”为投资绿色金融产品的主要制约因素(占比达41%),不仅影响市场主体对绿色金融产品的认知度和创新性,也影响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扰乱其对绿色项目的价值判断(薛强,2023)。

第二,缺乏环保信息管理平台和行业规制,难以解决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绿色产业信息不对称问题。ESG作为一种评估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投资理念和评价标准,在国际社会具有广泛认可度,但中国ESG体系的推进时间较短,尚处在建设和完善阶段,尤其在ESG信息披露领域还未形成规范统一的信息管理平台机构和行业规制(厉伟,2024)。目前国内ESG信息披露并非强制规定,而是采用“半强制+自愿”的方式,运营成本与财务收益的不均衡导致企业披露意愿普遍不高。同时,企业披露形式和途径各异,ESG关键信息不具有整体可比性,披露信息数量和质量的缺陷导致绿色金融市场在进行项目评估时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特别是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过程中,绿色金融市场亟须专业化和数字化的环保信息平台进行项目评估与验收,促进绿色经济的转型发展。

第三,绿色资产核算与环境风险评估等相关管理机构能力待提升,难以管理西部大开发的专业化资产与风险。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国土空间绿色开发过程中要聚焦生态资源保护,深度挖掘生态产品价值,统筹发展和安全(陈伟,2024)。当前西部地区绿色资产核算能力仍存在短板,资产来源与投向、运营规范性、担保有效性等都是市场主体在具体实践中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此外,有限的环境风险评估能力也是影响西部地区绿色可持续发展

的重要因素,经济社会和自然生态的环境风险评估结果,都决定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业务时准确认知和管理流程的专业性和前瞻性。因此,提升绿色资产核算和环境风险评估等相关管理机构能力,是西部地区当前以及未来一段时期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化高质量发展的任务之一。

四、绿色金融赋能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实践路径

中国的绿色金融领域仍面临多重发展困境,亟需从制度体系、市场规制、产品创新、价值取向四大维度协同发力,助力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高质量推进。这一过程需紧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目标,以绿色金融产品创新为关键抓手,推动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系统性优化升级。同时,要坚守金融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为构建大开放、大保护、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提供坚实的绿色金融支撑。

(一)以健全绿色金融制度体系为基础,不断拓展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新领域

中国绿色金融市场需要系统性完善政策法规、合作框架与监管制度体系,通过夯实制度底层逻辑,充分激发西部地区市场主体推进绿色化、合作化与规范化新格局的积极性。通过系统性完善,可夯实绿色金融制度基础,为西部地区构建绿色化、合作化、规范化新格局注入持久动力。

第一,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法规,为西部大开发绿色化发展提供法律支撑。作为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上层建筑,关于绿色金融的法律法规体系需从宏观和微观上协同发力。宏观层面,中国人民银行应牵头联合相关部门出台详实行动方案,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需形成可复制推广的经验样板,立法机关要将金融市场与环保信息纳入法律体系,通过广泛调研及时修正法律,纠治不法行为。微观层面,需细化政策法规中的责任与义务,强化环境与金融领域法律关联性,做好预期管理与政策协调以畅通业务实施;同时完善绿色金融分类标准的细则与流程,制定绿色债券、股票、保险、碳金融等工具的法制细则,增强全社会环保意识,支持西部地区因地制宜拓展新领域。

第二,构建绿色金融合作框架,为西部大开发

和合作化发展提供政策优势。绿色“一带一路”建设是西部地区绿色转型的关键抓手,需从国内国际双维度构建合作框架。国内层面,加强东中西部地区的区域协作,依托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机制,通过飞地经济、绿色产业合作、人才支持等措施,打破“经济—社会—技术”层面的地域限制,疏通西部地区绿色金融市场淤堵。国际层面,深度参与全球绿色金融体系,借助“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PSF)等机制,依托《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等成果推动多国标准融合对接(尹振涛,2023),促进跨境绿色资本流动,扩大西部地区绿色金融市场的国际接轨与开放程度,增强标准的可比性、兼容性与互操作性。

第三,强化绿色金融监管制度,为西部大开发规范化发展提供制度约束。随着金融创新深化,需突破传统监管模式局限。其一,坚持并完善“两委一行一局一会”+“各地局”的中国版“三层+双峰”立体式金融监管框架^②,借鉴国际监管经验,统筹协调推进监管工作;其二,因地制宜建设绿色金融业务标准,明确执法权责,延伸至财政补贴、绿色征信等领域,借助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评估并监管金融机构和企业,强化监管结果导向的奖惩力度;其三,在平衡监管压力、市场结构、交易成本等因素基础上,结合中国情境开展适应性学习,推动监管组织向适应性监管转型,适应环境变化(刘鹏等,2023)。

(二)以服务实体经济为目标,引导绿色金融市场与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深度融合

绿色金融发展需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核心目标,在充分考量地理区位特征与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完善战略规划顶层设计、培育绿色金融文化、转变金融发展理念,推动绿色金融与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深度融合。

第一,做好顶层设计,因地制宜推进绿色金融战略规划,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西部地区传统资源依赖型经济特征显著,绿色金融支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需依托丰富实践经验。2017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已指导西部地区建设6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③,但区域内仍存在供需错位、资源错配等问题。因此,顶层设计需充分结合西部地区传统产业绿色转型与产业承接的地域实际,在未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布局中注重增量扩面与提质增效,提出兼具地方特色与优势的经验指导,

强化增长极辐射效应,提升绿色金融市场主体的自主性与影响力。同时,依托西部地区重要生态资源禀赋,绿色金融需聚焦光伏发电、氢能开发运输、生态旅游等新型生态产业链,构建便捷投融资通道,鼓励科技创新以加速新产业落地,从根本上缓解区域绿色经济发展不平衡难题。

第二,拓宽绿色金融市场的同时培育绿色金融文化,提升服务质量以解决市场主体参与不充分问题。绿色金融高质量发展与金融强国建设离不开文化支撑。从需求端看,绿色金融文化的培育能提升市场主体金融素养,使其更好掌握金融知识、强化风险意识、转变传统消费习惯并增强维权能力,进而倒逼金融机构提升服务质量以匹配需求;从供给端看,以绿色金融文化引领金融部门深化绿色发展理念,可通过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约束自身行为,吸引绿色资金入市,提升服务质量与客户满意度。供需两端的均衡发展不仅能拓宽绿色金融市场空间,更能充分激发市场主体参与积极性。因此,培育绿色金融文化是破解市场主体参与不足的关键举措。

第三,尊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转变传统金融发展观念并拓宽服务覆盖面,实现绿色金融普惠发展。传统金融存在“嫌贫爱富”特征,导致经济相对滞后的西部地区面临严重金融排斥。作为新型金融业态,绿色金融需率先摒弃传统观念。一是在经营模式上挖掘金融工具与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发展的契合点,依据不同工具的法制细则拓展服务面,平衡项目商业性与公益性以破除金融排斥;二是改变服务对象聚焦国有企业与大中型企业的现状,重视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在绿色经济中的灵活性与创新性,推动绿色金融向该领域延伸,探索长效稳定供给模式,打通多方主体投融资渠道,持续注入“绿色”动能。

(三)以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为重点,推进西部地区整体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

金融机构应秉持社会生态环境与绿色金融产品客户共赢理念,通过推进产品创新开发、提高产品标准化水平、提升特色业务市场参与度,从绿色金融产品市场层面推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

第一,推进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开发,扩大绿色行业规模以支撑西部大开发。当前,绿色信贷作为

中国最成熟的绿色金融产品,在绿色融资总量中占比约90%,但绿色项目资金需求缺口仍然较大,仅靠绿色信贷难以满足。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绿色股票、绿色保险等多元化金融工具,同时鼓励绿色股权融资、绿色融资租赁、绿色信托及碳金融等多样化工具创新,吸引社会资本与外资参与传统产业转型及新兴产业培育,提供更大规模、更长期限且稳定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各银行需形成合力,借鉴国际经验,在丰富产品种类的基础上深耕客户群体,在服务企业绿色投融资的同时,填补针对个人与家庭的垂直供给空缺(翁智雄等,2015)。这种从种类到服务对象的全方位创新,将为西部地区金融市场注入绿色活力,有效扩大绿色行业规模。

第二,提高金融市场标准化建设水平,助力构建大保护、大开放的西部大开发新格局。中国金融标准化已进入全面推进阶段,绿色金融标准化对绿色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支撑与战略意义日益凸显。在制度引导与约束之外,中国人民银行应牵头推进绿色金融标准化工作,构建完善协调机制;针对西部地区地方金融机构在标准化建设中面临的难题,中国人民银行分支行需主动指导协调,依托政策与资金优势促进市场主体合作,助力西部地区绿色金融市场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同时,西部地区需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契机,借鉴国际绿色金融标准化经验,重点吸收贯穿绿色经济全链条的净零标准、绿色经济活动标准、金融产品界定标准、信息披露标准及碳核算标准等,推动西部大开发深度融入全球化,积极参与国际绿色金融标准制定。

第三,提升绿色金融特色业务市场参与度,鼓励多方主体共建新西部。绿色金融业务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新格局提供绿色动力,需通过特色业务激发多方主体参与活力:一方面,金融机构需立足能源资源型经济特点,针对以碳排放为主要排放源的传统产业,创新碳市场融资、交易及支持工具,完善排放配额(CEA)与核证自愿排放量(CCER)交易链,盘活企业碳资产,为实体经济提供低碳转型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聚焦西部生态资源禀赋,在政府授权下,金融市场主体合力建立“生态银行”,将业务垂直辐射至多元绿色产业,形成规模化运营,完善“生态资源—生态资产—生态资本”转化模式(杜

健勋等,2023)。通过提升特色业务参与度,降低传统产业转型成本,满足科创企业研发需求,推动多方主体共同参与新西部建设。

(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促进绿色金融推动西部大开发高质量发展

随着绿色金融对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绿色转型的影响持续深化,金融机构在服务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需充分彰显党的领导核心作用,锚定新发展格局,践行“金融为民”理念,以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推动高质量发展。

第一,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践行绿色金融“统筹规划、一以贯之”的发展逻辑。一方面,需强化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效能:一是精准把控绿色金融发展方向,在引导市场主体与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基础上,保障合理收益以维系服务持续性;二是统筹谋划绿色金融发展全局,协调中央与地方各级金融管理部门职能,优化金融机构与监管体系的协同运作,降低金融风险以维护行业安全稳定;三是提升金融政策制定科学性,通过研判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统筹各方利益诉求,确保政策的可行性与系统性。另一方面,需深化金融系统中党的建设: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依据绿色金融行为规范引导从业人员树牢政治意识与正确职业观、价值观;完善组织建设,夯实基层党组织架构,提升干部队伍专业素养以强化绿色经济金融主体间的协同联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将正风肃纪与金融改革、制度完善、治理优化、行业发展深度融合,保障金融体系健康运行。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既是中国金融发展的鲜明特色,亦是核心优势。

第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绿色金融与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协同赋能、共生发展”。在国内大循环层面,通过消费与投资双轮驱动来实现绿色金融与西部绿色经济的深度绑定:一方面,适应消费升级趋势,结合区域产业特色与居民需求,适度扩大绿色低碳产品消费券比例及“以旧换新”补贴强度,激活绿色消费市场活力并普及绿色消费理念;另一方面,响应投资需求特征,针对西部地区产业投融资特点,给予政策倾斜以提升征信水平与投融资强度,优化监管领域的信息披露与风险评估机制,推动ESG投资理念与评价标准的科学化、统一化建

设。在双循环协同层面,需强化国际合作,推动西部地区绿色金融标准的国内统一与国际互认,构建适配国际能源格局调整的金融支持体系;在国际竞争与金融强国建设背景下,培育西部地区金融中心的辐射功能,打造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金融高地。

第三,坚守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构建绿色金融“全社会参与、全民共享”的实践格局。在“双碳”目标引领下,全球加速能源转型,中国西部地区绿色资产扩张态势显著。金融机构需以此为切入点:一是聚焦《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2025年本)》,结合市场趋势研判确定行业与区域投资策略,依托专业资本运作引导金融资本精准赋能西部地区特色优势产业、新兴产业及未来产业,推动全社会参与;二是深化“两山”理论实践,科学评估西部地区自然资源资产价值,创新绿色生态产业抵质押担保机制,构建数字技术驱动的风险评估模型与规避体系,探索产业绿色融合融资创新,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实现绿色发展成果全民共享。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网址:<https://iigf.cufe.edu.cn/ljsrjsk/dfljsjk.htm>。②“三层”是指顶层为中央金融委员会和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两委);中间层为各金融监管部门,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一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一局)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一会);底层为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和地方金融监管局(各地局)。“双峰”则是将监管部门的具体职能分为审慎监管和行为监管。③西部地区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名单依次为:贵州省贵安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市、昌吉州和克拉玛依市,甘肃省兰州市新区,重庆市。

参考文献

- [1]何茜.绿色金融的起源、发展和全球实践[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
- [2]王遥.绿色金融体系如何推动经济绿色转型[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1).
- [3]邵光学.我国绿色金融研究述评[J].湖南社会科学,2019(3).
- [4]薛博文,冯宗宪.中国区域绿色金融发展评估[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6).
- [5]田惠敏.绿色金融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J].中国科技论坛,2018(4).

- [6]何德旭,程贵.绿色金融[J].经济研究,2022(10).
- [7]王志强,王一凡.绿色金融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路径与对策建议[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0(3).
- [8]文书洋,刘浩,王慧.绿色金融、绿色创新与经济高质量发展[J].金融研究,2022(8).
- [9]陈文俊,牛永涛.对强化西部大开发金融支持的几点思考[J].金融研究,2000(3).
- [10]林凌,刘世庆.开发性金融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地位和作用[J].经济体制改革,2005(1).
- [11]白津生.西部大开发中的政策性金融支持研究[J].甘肃社会科学,2009(2).
- [12]朱冬亮.贫穷的本质:基于精准扶贫实践的思考[J].人民论坛,2020(1).
- [13]程惠霞.基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金融扶贫政策“三维一体”赋能新路径[J].中国行政管理,2021(9).
- [14]季宇,姜金涵,宋兰旗.绿色信贷对低碳技术进步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1(9).
- [15]蔡之兵,李东兴.国家发展逻辑转变与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操作重点研究[J].农村金融研究,2024(8).
- [16]高世楫.绿色生产力与绿色低碳发展的创新路径[J].探索与争鸣,2024(3).
- [17]王勃.绿色金融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J].贵州社会科学,2024(8).
- [18]白彦锋.推动“双碳”目标如期实现的财税政策选择[J].人民论坛,2023(24).
- [19]朱朝晖,谭雅妃.契约监管与重污染企业投资效率:基于《绿色信贷指引》的准自然实验[J].华东经济管理,2020(10).
- [20]刘华军,张一辰.新时代10年中国绿色金融发展之路:历程回顾、成效评估与路径展望[J].中国软科学,2023(12).
- [21]李翔宇.绿色金融背景下我国环境信息披露的现状检视与规制进路[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3).
- [22]姚进.绿色金融政策体系更加成熟[N].经济日报,2024-04-25.
- [23]夏梓耀.绿色金融发展的法制困境与出路[J].环境保护,2018(19).
- [24]马玲.因地制宜“碳”新路[N].金融时报,2024-03-01.
- [25]张东刚,王文,殷红,等.中国绿色金融发展研究报告2024[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25.
- [26]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金融稳定分析小组.中国区域金融稳定报告2024[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24.
- [27]任缙.绿色金融与脱贫攻坚的内在联系与衔接路径[J].环境保护,2019(1).
- [28]苏赞.强化绿色金融支撑筑牢生态安全屏障[J].中国金融,2024(19).

- [29]赵亚娜.绿色“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路径与世界意义:基于全球环境治理的视角[J].国际展望,2023(1).
- [30]胡健.资源型企业探索绿色化转型[N].人民日报,2023-06-24.
- [31]薛强.百姓绿色金融认知及参与情况调查[J].金融博览,2023(24).
- [32]厉伟.ESG体系建设中的国际话语权分析[J].求索,2024(3).
- [33]陈伟.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进程中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10).
- [34]尹振涛.中国金融监管的新动向与重要意义[J].人民论坛,2023(8).
- [35]刘鹏,郭戈英.走向适应性监管:理解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改革的治理逻辑[J].学海,2023(3).
- [36]翁智雄,葛察忠,段显明,等.国内外绿色金融产品对比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5(6).
- [37]杜健勋,卿悦.“生态银行”制度的形成、定位与展开[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3(2).

Green Finance Empowering Wester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Internal Logic and Practical Paths

Bai Ke Zheng Xiaoning Zhou Jian

Abstract: For the new-era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developing characteristic and advantageous industries serves as the primary focus. It is an inherent requirement to uphold high-standard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to underpi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enhance the region's overall strength, and pursue a new path of eco-priority and green development. Green finance represents a crucial orientation of contemporary financial development. It acts as a key financial pillar for further advancing the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into a new phase, and also serves as a vital driving force for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itself as well as the green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By guiding resource allocation, leveraging cost advantages, optimizing risk management, and facilitate signal transmission, green finance drives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fosters the agglomeration of green industries, facilitate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green economy, and thus constructs a new landscape for the new-era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Currently, the main obstacles restricting green finance from empowering the new-era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lie in institutional, market, product, and service dimensions.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improve the green finance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guide the green finance market to serve the real economy, continuously innovate green financial products, adhere to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finance for the people", and consolidate the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green finance to fuel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new-era Western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 Words: Green Finance; Wester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Internal Logic; Practical Paths

(责任编辑:彦 伦)